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核心概念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Deborah Lupton

## Risk

# 风险

[澳大利亚] 狄波拉·勒普顿 著 雷云飞 译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核心概念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 风险

[澳大利亚] 狄波拉·勒普顿 著 雷云飞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险 / (澳) 勒普顿 (Lupton, D.) 著 ; 雷云飞译

·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3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 Risk

ISBN 978 - 7 - 305 - 14467 - 7

I. ①风… II. ①勒… ②雷… III. ①风险管理—研

究 IV. ①F27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5594 号

Risk / by Deborah Lupton / ISBN: 0 - 415 - 18334 - 0

Copyright@ 1999 by Deborah Lupto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 - 2011 - 53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从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风 險

著 者 [澳大利亚] 狄波拉 · 勒普顿

译 者 雷云飞

责任编辑 李 博 黄隽翀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1.25 字数 150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4467 - 7

定 价 30.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歷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露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 目 录

- 1 / 第一章 导言
- 4 / 风险含义的变迁
- 11 / 章节介绍
  
- 14 / 第二章 风险理论化
- 14 / 认知科学视角
- 20 / 社会文化视角
- 23 / 社会建构主义者的立场
- 27 / 结语
  
- 29 / 第三章 风险与文化
- 30 / 文化的重要性
- 32 / 纯净、危险与身体
- 36 / 风险与责任
- 40 / 网格组模型
- 45 / 结语
  
- 48 / 第四章 风险与自反性现代化
- 48 / 贝克与“风险社会”
- 54 / 自反性现代化
- 57 / 个体化
- 59 / 吉登斯的风险观
- 63 / 信任

66 / 结语

69 / 第五章 风险与治理性

70 / 治理性

74 / 从危险到风险

77 / 当代的风险策略

82 / 结语

84 / 第六章 风险与主体性

85 / 风险知识与自反性

91 / 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

95 / 审美与习惯维度

98 / 结语

99 / 第七章 风险与差异性

100 / 具体化

104 / 混杂性与局限性

110 / 差差异性的精神动力

114 / 空间性与差异性

118 / 结语

119 / 第八章 风险与愉悦

120 / 逃逸企图与刀刃作业

126 / 作为性别化展现的冒险

131 / 欲望与越轨

137 / 结语

139 / 参考文献

151 / 索引

# 第一章 导 言

1

在写到中世纪法国的生活史时,罗伯特·穆尚布莱(Robert Muchembled)(1985)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农民和贵族阶级都面临着众多危及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和风险。在这个时代中,死亡“处处呈现,达到泛滥的程度”(Muchembled 1985:31)。这些威胁和危险中最极端的就是饥饿、寒冷、传染病和战争。在欧洲中世纪末期,食物的供应是非常匮乏的,饮食结构中最基本的是谷物,其产量易受季节的影响。婴儿死亡率极高,人的寿命短(活到40岁就被认为是达到了“公平”的寿命)。各种传染疾病诸如天花、百日咳、伤寒、梅毒、痢疾和瘟疫在村庄和城镇中屡见不鲜,致使大量人口死亡。生活在农村的人们面临着其他危险,诸如狼群会袭击小孩子,而且偶尔在田间和村社附近袭击成年人;一旦出现野狗咬人,就可能会带来狂犬病的威胁;野猪会袭击并吞噬小孩子;成群的强盗游荡于森林和交通要道,经常袭击和抢劫农民;家族之间频繁而又暴力的仇恨和冲突常常导致谋杀。

在那个世界,不安全是普遍而持久的,“恐惧、真实与虚假比比皆是”(Muchembled 1985:22)。死尸在公众眼里随处可见,悬挂在绞刑架上的被绞死者的尸体,持续几天或几周在公共场所慢慢地腐烂,行刑就发生在公共场所,被杀的强盗和列兵的尸体跟那些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乞丐和流浪者的尸体在大道上随处可见。村民和市民晚上把自己关

2

在居室内,一旦夜幕降临他们就不敢出去,因为夜晚被看作各种危险的地盘,即妖怪、恶魔、巫婆、狼人、怪兽的王国。他们也同样惧怕那些被看作扰乱事物秩序的自然现象,诸如彗星、极寒、地震、洪水(ibid. :25 - 26)。

因此,在中世纪的法国,与基督教稍许相连的法术成为一种信仰系统,通过这一系统,从概念和行为上解决各种威胁和危险,使人们觉得他们多多少少有一些控制世界的能力。超自然的存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且结合了有复仇心理的上帝和邪恶的撒旦的观念。产生了一系列迷信做法以应对邪恶,包括笃信不祥之兆、到神社朝圣、护身符、对神的供奉、对诸如十字路口这样的禁忌之地和诸如麻风病人与吉普赛人的规避(ibid. :29 - 30)。日常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俗和信条,这些风俗和信条规定了某种行为准则或规避行为,以抵御危险和疾病。例如在法国一些地区的人们认为,出生在五月的小猫就一定要被淹死,否则危险就会降临。

以上对中世纪法国的日常生活和信条的描述,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叙述了人们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文化背景中如何应对危险、损害和恐惧。正如穆尚布莱所言,社会发展了一套策略和信条系统以应对、遏制和防御危险。缺少这种系统就是把某人抛置在命运的摆布之中,放弃了任何形式的控制。在当代西方社会,掌控人生的想法已越来越受重视,“风险”的概念现在被广泛地用来解释偏离标准、不幸和恐怖事件。这个概念强调人类的责任并认为通过“采取某些行动”可以防止不幸的发生。虽然当前的不安全感是很普遍的现象,正如在近代之前一样,但还是存在不同形式的恐惧以及导致焦虑的不同方向和原因。尽管我们不再常常看到横躺着的死尸,尽管瘟疫已不再是一个导致死亡的原因,尽管婴儿死亡率急剧降低,并且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可以期望健康地活到老,但是我们害怕成为犯罪活动和癌症的受害者,害怕卷入车祸,害怕失业,害怕婚姻破碎和孩子学业的荒废。在前现代时期,我们的不确定性的象征性基础是由秩序紊乱而造成的焦虑:无法控

制我们的身体、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的生计及我们驾驭日常生活的程度。

在前现代时期,我们或许承认威胁存在,但是仍然认为可以做一些事情去应对它们。我们也许不会采取把出生在不祥月份的不幸的小猫淹死的举动作为一种风险防御的策略,但是我们有一系列在情绪方面有助于达到该目的的策略:鼓动反污染立法、关注个人饮食结构、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做检查诊断、在家里安装防盗铃、阅读自助书籍或购买人身保险等,都是人们尝试遏制和管理由于被自身看作危险或威胁而引发的不安和恐惧的途径。理智的思考、用于防范的官僚系统、在威胁发生之前识别威胁的方法,都是经常被提出的管理危险和威胁的手段。<sup>4</sup>

对澳大利亚阿瑟港(Port Arthur)屠杀事件的反应就是一个例子。1996年4月28日,一个年轻人——马丁·布莱恩特(Martin Bryant)——进入位于澳洲塔斯马尼亚岛州的亚瑟港历史名胜景区,使用两支半自动武器向正在那里旅游和工作的人群肆意扫射。他随后离开亚瑟港窜入一家旅店,射杀店内人员并在途中挟持了一名男性人质。布莱恩特直到第二天清晨在点燃整个旅馆之后离开时才被抓获,他导致35人死亡17人重伤。

对在澳大利亚及海外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阿瑟港屠杀事件,媒体所报道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质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在力图解释布莱恩特行为的过程中,大量的意见被提了出来。其中一个想法就是布莱恩特曾经接触了太多的影响他去付诸谋杀行为的暴力影片或者“污秽视频(video nasties)”。一些媒体报道指出: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由于他的“单纯”或者太软弱的外表而被欺负,这场谋杀或许就是一场对这个世界的残酷的报复行为。还有人指出布莱恩特的父亲是一个凶残的人,在布莱恩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殴打他,这导致布莱恩特走上了暴力的道路。人们呼吁了多个行动方案。其中主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枪械管制,特别是半自动武器。新的枪械管理条例被采纳为风险控制的策略。第二个被提出的方案是禁播或管制暴力影片和视频。更

进一步指出具有精神科病史的人不得申领持枪证。所有这些策略都旨在恢复对一个不曾预料到的邪恶行为的控制,帮助人们应对恐慌、愤怒和挫折,以及他们在面对马丁·布莱恩特的行为时所感受到的控制力的缺失。这些策略都是以后现代方式思考和应对风险的产物。

## 风险含义的变迁

几个世纪以来,“风险”这个词已经改变了自身的含义,它的使用变得更加普遍并应用于多种情况。卢曼(Luhmann)(1993:9)提出,“风险”这个词分别于16世纪中期和17世纪后半期出现在德文和英语引用中。然而他注意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术语“riscum”已经在此之前多个国家如德国中使用了很长时间。大多数评论员将风险这个词和概念的出现与前现代时期航海冒险联系了起来。埃瓦尔德(Ewald)指出“风险”这个词首先出现在中世纪,与航海保险有关,并且用于说明可能影响某次航行的风险:“当时,‘风险’特指一个客观危险的可能性、神的行为、不可抗力、一场狂风骤雨或者其他不能归咎于错误行为的海洋风险”(ibid.:226)。因此,风险这个概念排除了人的过失和责任因素。风险被意会为诸如暴风雨、洪水和传染病这些并非人为的自然事件。这样一来,人类只能试图粗略估计正在发生此类事件的可能性并且采取行动减少其影响。

风险的含义及其应用的变迁与现代化的进程有关,现代化开始于17世纪并在18世纪快速发展。现代化被定义为“首先在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建立的体制和模式,但是在20世纪其影响力显著提高,已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Giddens 1991:14-15)。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国家(industrialized world)”,综合了资本主义、监督机构、核武器和工业主义的进程。现代化基于17世纪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概念,即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秩序的关键是通过科学探索和理性思考

获取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它认为社会和自然界遵循着的是那些可以被测量、推理并最终可以被预测的规律。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期间,早期实现现代化的欧洲国家试图卓有成效地控制人口和应对由工业革命过程中大规模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造成社会变迁和动荡。概率和统计科学被发展成为计算标准和鉴别偏离标准的手段,也因此体现了当时认为理性的计数和排序可以治理社会紊乱的想法(Hacking 1990)。这些领域在当时已成为现代主义者技术性风险概念的重要基础。在 18 世纪,利用概率数学中的新理念,风险这一概念开始被科学化。在现代化初期,风险的数理统计的发展和保险工业的扩张意味着:只影响个人的后果称为“风险”,是系统性地造成的、可从统计学角度描述的,并且在那种意义上“可预见的”类型的事情,这些事件因此也受到超越个人和政治识别、补偿和规避规范的支配(Beck 1992a:99)。到了 19 世纪,风险的概念被扩展了。它不仅被限定在自然领域,而且“也存在于人类当中,在他们的行为中,在他们的自由中,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在他们与所处社会彼此联系的这一事实当中(Ewald 1993:226)。

现代主义者的风险概念代表了一个新的观察世界及其混乱表现、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方式。他们认为不曾预料的结果可以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不是“表现自然所隐藏的含义或者神灵不可言说的意图”,这种观念极大地取代了更早的“宿命论”或“福祸说”(Giddens 1990:30)。正如雷迪(Reddy)所说:“现代人通过发明‘风险’一词已经消除了真正的非决定性或者‘不确定性’。他们已经学着通过可计算(calculability)的神话把一个彻底的非确定性的宇宙改造成一个可管理的宇宙”(Reddy 1996:237)。卡斯特(Castel)则走的更远,他认为现代对风险防范的痴迷是建立在

“一个宏伟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理性化的旨在完全控制偶发事件……即不可预见事物的爆发……的梦想,一个庞大的保健专家乌托邦在恐惧和安全的交替视域中左右逢源,

注入极度的理性,一个基于计算之理性的纯粹统治,一个并非不纯粹的为了让一辈子什么事情都不发生的,由代理人、计划者和技术专家、幸福管理者组成的特权。”(Castel 1991:289)

在现代性领域,风险,从其纯粹技术上的意义来说,开始是基于一桩事件的可能性预见是被可知的或可知的这一条件。相比之下,当这些可能性是不可预见或不可知的时候,才会使用不确定性(uncertainty)来替代。例如,在 19 世纪中期发展的某种经济理论中,风险是区别于不确定性的。这个区分说明有一种非决定性,是不以对各种可选概率的可能性的理性计算为条件的,根据不同选择的可能性之可能的理性推测(Reddy 1996: 22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一位很有影响的英国经济理论学家,利用这一区别说明投资者的行为应属于受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规律支配的范畴,由于他们被“动物精神”驱使着。“就其本性而言,这种‘动物精神’是不以概率或‘风险’分析为条件的”(Reddy ibid. :229)。

现代主义者的风险概念还包括风险可能有好也有坏的思想。随着风险的概念在保险业中的发展,风险一方面可以指机遇或可能,另一方面也可以指损失和破坏。这两方面的概念在事故概念中结合在一起,为预防事故,当事人会为自己投保,“保险的一般模型就是机遇的博弈:一个风险、一个事故被看作赌博中轮盘上的一个数字,一叠扑克牌中抽出来的某一张牌。随着保险的发展,博弈变成了一个世界的符号”(Ewald 1991:199)。从这个视角来看,“风险”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特指某些事情发生可能性,与其相联系的损失和收益的规模有关。换句话说,风险曾经分为“好”的风险和“坏”的风险(Douglas 1992:23)。风险的这个含义直到 19 世纪初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在 20 世纪末,风险和不确定性与“好风险”和“坏风险”之间细微的差别逐渐消失。正如道格拉斯指出的,现在对风险的使用与概率计算没有太多的联系。概率科学领域在过去向风险这一概念招手,建立了两者最初的联系:当时“风险”这个词指危险;“高度风险”指非常多的危

险(Douglas 1992:24)。现在“风险”一般只用于联系消极的和不受欢迎的结果,不指积极的结果。对风险更具技术性的评估也是如此:“尽管风险——成本——收益分析集中在对潜在的积极和消极结果的分析上,在这些分析过程中趋向于不理会收益分析,对风险的积极方面的分析也是一样”(Short 1984:711)。在经济投机这一仅限于圈内人的说法中,在说到获利时,还是会提到“好的风险”。人们意识到在投机行为中赚钱一定要冒险,亏钱的风险越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收益也就越大(Luhmann 1993:71)。

在外行人日常的语言中,风险常常被用于特指一个威胁、冒险、危险或者伤害,我们投资股票市场“就是将毕生积蓄置于风险中”,或者搞外遇“就是将使我们的婚姻置于风险中”。这个词也从较低的程度上被用于指一个有些消极但不是灾难性的结果,正如“在下雨天如果你站在外面,就有感冒的风险”这个习语一样。在这个用法中,与其说风险指的是可能的危险或威胁,不如说是指不幸的或令人恼火的事情。因此,在日常用语中风险是一个非常宽松的词可计算的概率问题对于日常用语中的风险不一定是很重要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概念上趋向于指代相同的事物,例如,“风险”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表示一个可能产生实际危害的现象,不管这种导致危害的可能性是否可预见。

在当今西方社会,名词“风险(risk)”和形容词“风险的(risky)”在大众和学界的语境中已经开始被非常普遍地运用。一套用于专家研究、知识和建议的工具已围绕风险概念发展了起来: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传播和风险管理都是主要的研究和实践领域,用于在诸如医学和公共健康、金融、法律和工商业等尽可能多的领域衡量及控制风险。确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风险这个词的使用量似乎一直在增加。一项对风险一词在学术期刊文章题目中使用频率的调查发现其在 1966 年到 1982 年之间呈指数增长,特别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之后(Inhaber and Norman 1982, cited in Short 1984:712)。对在美国、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出版的一些医疗和流行病学期刊的一项更具体的调

查,也发现从 1967 年到 1991 年这个时间段内对风险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不断增加,20 世纪 70 年代末再一次成为对风险一词使用的快速增长时期,这一趋势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得到了加速(Skolbekken 1995)。

我对“风险”一词在更常见的媒体形式——一家澳大利亚日报,《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sup>①</sup>中的使用做了快速调查。我使用了由该报编译的计算机化数据库,去搜索该报从 1992 年到 1997 年(该数据库最早仅能查到 1992 年的数据)这 6 年中发表的所有文章的主要文本和题目中对风险这一词的使用。我发现这个词在这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使用频率高,而且出现的频率也在逐步增加。1992 年,“风险”在新报道的主要文本中出现了 2356 次,在标题中出现了 89 次。提到风险的频率每年都在稳定增长。到 1997 年,“风险”在文章中出现了 3488 次(较之 1992 年的多出了一半以上),在标题中出现了 118 次。这个发现说明风险已经替代了诸如“危险”、“威胁”和“损害”成为新闻媒体中一个更关键的词。

针对过去的几十年里风险的概念和语言在学界的广泛应用,目前已提出多种原因。包括概率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通过以往不能实现的方式对大量数据集的统计操作成为可能,相关机构和监管部门被建立,以应对诸如核能等被认为是高风险的现象。科学思考从摆脱单一原因(monocausal)的绝对主义范式到综合多元因果的变化,以及对科学理性赋予更多的价值使其作为确定性的基础,都被提出来以重视更多的风险问题(Short 1984; Douglas 1985; Skolbekken 1995)。一些评论员也指出了作为公众和学界不断关心的风险问题在本质上的变化。在 20 世纪后半期,他们指出风险在其影响上已更全球化、难以识别和更为严重,因此更不易管理并且更易引起焦虑(Beck 1992b)。

<sup>①</sup> 《悉尼先驱晨报》于 1831 年在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创刊,它与《世纪报》一起,被誉为澳大利亚最有影响的报纸,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声望。——译者注

从更深层次的含义上讲,可以说当代对风险概念的迷恋,源于社会从前现代(pre-modern)到现代再到晚期现代(late modern)或曰后现代(postmodern)——正如一些理论家喜欢描述的当前这个时代一样——转变过程中内在的变化。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一般指自二战以来在西方社会已经发生的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其使得很多人认为我们正“生活在新时代”里(Smart 1993: 15)。这些变化包括冷战的结束、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通信技术的传播和女权主义运动导致的家庭关系和工作场所的变化、经济的下滑和不断发展的世俗主义(secularism)。大多数理论家认为,后现代性的特点是对早期或“简单”现代性失败承诺的逐渐认识和挑战这个时代的关键设想的倾向,特别是坚信科学和医学是进步的前沿的设想。因此,后现代性已经被定义为“一个更合理的现代性,标志着现代性与其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达到和解”(Smart 1993: 12)。

因此,后现代性或多或少涉及对思想构建、表达和实践的质疑,以及对传统的解构(ibid. : 24)。对于许多评论员而言,后现代时代的特点是由不断变化和融入、文化碎片和标准及传统的瓦解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矛盾心理所构成的(Giddens 1990; Massumi 1993; Lash and Urry 1994; Featherstone 1995)。时空已变得被压缩,越来越多的主体和客体快速产生,事物与社会关系的既定意义不断变化。由于老传统已被质疑,导致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当前的西方社会已经被描述成“后传统”(Giddens 1994: 56)。

所有这些变化都推动了一个通过特别的方式来看待自我以及与原先的时代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方法的产生。对于个人而言,有观点认为与这些变化相连的是对不确定性、复杂性、矛盾(ambivalence)和紊乱的强烈认知,对社会机构和传统权威的日益不信任(distrust),对日常生活内在威胁的不断认识。卢曼(1993: 4—7)声称风险意识的特点是对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极端不可能情况的痴迷。他并非简单地认为这些情况有存在的技术条件,而是认为自然灾害总是会发生。他认为这

种痴迷是当今个人或组织的决策可能被认定为灾难的根本原因,因此,为了避免风险,人们应该反对他们的决策。近年来,风险的概念已越来越受重视,因为社会的未来对决策的依赖性增加了,如今,风险概念在关于未来的思考中已经占主导地位。

对于后现代时期的几个作家而言,风险的概念被当作关键词使用。它已成为恐惧、焦虑和不确定性情感的焦点。由于在 19 世纪末(*fin de siècle*)——并且实际上是一个世界的千年之末(*fin de millenium*)——普遍存在的情绪不适和精神错乱,一种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终结的时代和一个重大毁灭性的社会转型时期的感觉。使得人们对风险的关注日渐加剧。“恐慌”这个词已经被一些作家用来描述后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存在状态(Kroker and Kroker<sup>①</sup>1988)。马苏米(Massumi)认为后现代的个人通常经历的恐惧感较低,这种恐惧是模糊的,不像恐慌一样急剧或者像歇斯底里(hysteria)一样的集中化(localized),而是“一种充满存在的背景辐射”(1993:24)。他认为 1963 年 11 月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被暗杀是美国文化的分水岭——从启蒙人道主义和进步的乐观主义转向后现代时期的悲观和不确定性。

到处开始出现裂隙,不再有安全的地方。枪击可能来自  
任何方向,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甚至觉得愉快不再与  
以前相似,吸烟是致命疾病之危害的开始,食物成为心脏病的  
前兆。身体本身就是对“自我”的颠覆;在“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中,肉体的存在就是堕落的开始……曾是进步信使  
的工业化给世界环境带来崩溃的威胁……不管在任何地方,  
都会有将至的灾难。(Massumi 1993:10)

与这个世界之变化并行的是围绕着风险而建构的意义和策略,这些都源于后现代时期特有的不确定性、焦虑和缺乏可预测性以及试图对它

<sup>①</sup> 分别是 A. 克洛克和 M. 克洛克,参见文后索引。——译者注

们提出解决方案的想法。虽然风险的意义和策略就是试图去驯服不确定性,但是其矛盾的结果通常是:由于强化对风险的注意力和顾虑,反而增加了对它们的焦虑。

## 章节介绍

本书分析了西方社会给风险定义及应对风险的方法。本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风险”的识别应当基于我们所处的特殊社会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将某些事情称作“风险”就是承认它们对我们主体性的建构和幸福(wellbeing)的重要性。在某个时期的某些社会中,某些现象被认为是引起焦虑的焦点。在其他国家和时代里,另一些现象则被认为是突出的,从而被定义为有风险的(risky)。

例如,在当前西方社会个人和机构的关切中占主导地位的“风险”至少可分为六大类。它们是“环境的风险(environmental risks)”,即由污染、辐射、化学、洪水、火灾、危险的路况等带来的风险;“生活方式的风险(lifestyle risks)”,与诸如食物和毒品等的消费、性活动、驾驶实践、压力、休闲等相关;“医疗风险(medical risks)”,与人们所经历的医疗和治疗相关(例如,药物治疗、外科手术、分娩、再生产技术、诊断);“人际风险(interpersonal risks)”,与人们的亲密关系、社交活动、爱情、性别、性别角色、友情、婚姻和亲情相关;“经济危机(economic risks)”,暗含于失业或就业不足、债务、投资、破产、财产损失、商业失利等之中;“犯罪风险(criminal risks)”,源于非法活动的参与者或潜在受害者。14

识别这些不同类型的风险范畴,在当前这一历史时期显得如此重要,也说明了这些范畴是在更加宽广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中获取其自身含义的本质特点。我们对这些风险及其他风险的认知丰富了主体性和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包括我们怎样过日常生活,我们怎样把自我和我们参与的社会组织与其他个人和群体区分开来,我们如何感